

三明医改:求解世界性难题的改革样本

实行医药、医保和医疗“三医联动”改革,有力解决了医改“碎片化”的问题

□ 陈弘毅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答题”的难度和挑战不言而喻。

2012年以来,地处福建省内陆山区的三明市勇于涉“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不断突破旧有利益樊篱和体制机制障碍,闯出了一条破解医改难题的新路子,贡献了中国新一轮医改进程中备受瞩目的地方样本。

小城市推动大改革

三明医改,缘何而起?

不少三明人认为,三明是一座因三线建设兴起的工业城市,人口少、经济体量小、退休人员比重较高,“未富先老”现象明显,医保基金曾面临“穿底”风险。因此,三明医改是一场“被逼出来的改革”。

然而,更深层次的动因,却是医疗、医药体制长期存在的“顽疾”:医保基金的巨大浪费,不合理的医药体制,有悖医院治病救人的宗旨,让一些患者蒙受着“看冤枉病、吃冤枉药、花冤枉钱”的“二次伤害”。

医改千头万绪,从哪里打响“第一枪”?三明瞄准了虚高的药价。2012年,三明通过重点监控药品使用行为,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当年,全市医药收入年均增长15%的势头就降到了7%左右。

2013年以来,三明通过药品耗材价格调整,共增加医疗服务收入48.7亿元。同时,全市县级以上公立医院药占比从2011年的46.77%降到2019年的24.57%,而医药性收入从18.37%上升为40.59%。

三明市副市长张元明认为,挤压药价虚高是医改推进的关键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以此为杠杆,三明进而实行医药、医保和医疗“三医联动”改革,有力解决了医改“碎片化”的问题。

在医疗服务方面,三明通过改革薪酬总量核定办法,医务人员的门诊和手术等医疗服务量直接与薪酬挂钩。从2011年到2018年,全市县级以上公

立医院平均年薪从4.22万元上升到11.34万元,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大幅提升。

“让广大白衣天使拿着干净而又体面的收入,专注于治病救人的使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三明市尤溪县总医院党委书记杨孝灯一语道破医疗改革的初心。

针对医保基金管理“九龙治水”的痼疾,三明在全国率先将原来分别隶属于人社、卫生等部门的24个医保基金经办机构进行整合,组建了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2016年,又率先将药品采购和医疗服务定价等职能统一到全国率先组建的医保局中。

“三保合一”后,三明推进按次均费用、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等多种复合付费方式的改革,发挥医保基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百姓正确就医,控制不合理医疗支出。

一组数据揭示了医改带来的直观“红利”:2019年,三明人均医疗费用1734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与此同时,基层就诊率不断提升,如三明下辖的将乐县,县域内就诊率从2015年的79.5%提高到现在的93.6%。

“动真碰硬”深化改革

“没有一项改革是在和风细雨中完成的。”这是三明医改经历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三明医改的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复杂敏感的权益调整。为此,改革者乃至整个三明一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对内有个别医护人员消极对待医改,少数患者不理解医改;对外则有医药代表放言丢掉三明市场。

在以“治乱”为主的改革早期,三明建立了跨地区药品耗材联合限价采购的“三明联盟”,通过做大采购总量来换取药企主动降价,这一改革举措曾让不少医药代表惊呼“三明动真格的了”“医药行业要重新洗牌了”。

“三明医改可谓‘刀刀见血’,不是简单动了个人的‘奶酪’,而是彻底改变了‘从来如此’的利益分配格局,遭到阻

挠是必然的。”三明市医保局局长徐志奎说。

“只要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就放手去干!”在三明医改一度遭到冷遇时,时任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组长的詹积富记得,当时三明市党政主要领导始终给予支持、勇于担当。

“敢为天下先”的三明医改,在打出“三医联动”组合拳后,如今已经进入以“治未病”为重点的新阶段,正着力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民健康服务体系。

2017年,三明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上下联动的紧密型医疗共同体,组建了10个县级总医院、2个市区紧密型医联体,构建起了区域健康管护组织。通过实行医保打包支付,对各总医院实行“总额包干、超支自负、结余留用”,推动县级医疗人才、诊疗病种、卫生资源下沉到乡村。

谈起近年来医院的变化,将乐县总医院心内科副主任肖春林体会深刻:“新的体制下,医生、护士每周都下去,不仅是坐诊,还要指导卫生院、卫生所做好患者健康管理,到社

区、农村做讲座。群众少生病了,医保资金结余了,大家参与健康管理也能提高绩效。”

改革再出发

“自始至终,三明医改人始终谨记为何改、为谁改这一根本问题。”三明市委书记林兴禄斩钉截铁地说。

2013年,三明将原先分散在人社、农业、卫生等部门的医保职能集中时,新部门究竟叫“医疗保障管理中心”还是“医疗保障管理中心”存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就叫“医疗保障管理中心”。

“保险与保障,一字之差,体现的是政府承担起保障和守护人民群众健康责任的准确定位。”詹积富说。

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郑振俊说,三明医改在前行过程中能够不断啃下各种“硬骨头”,根本在于切实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对医改工作的统一领导,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2019年11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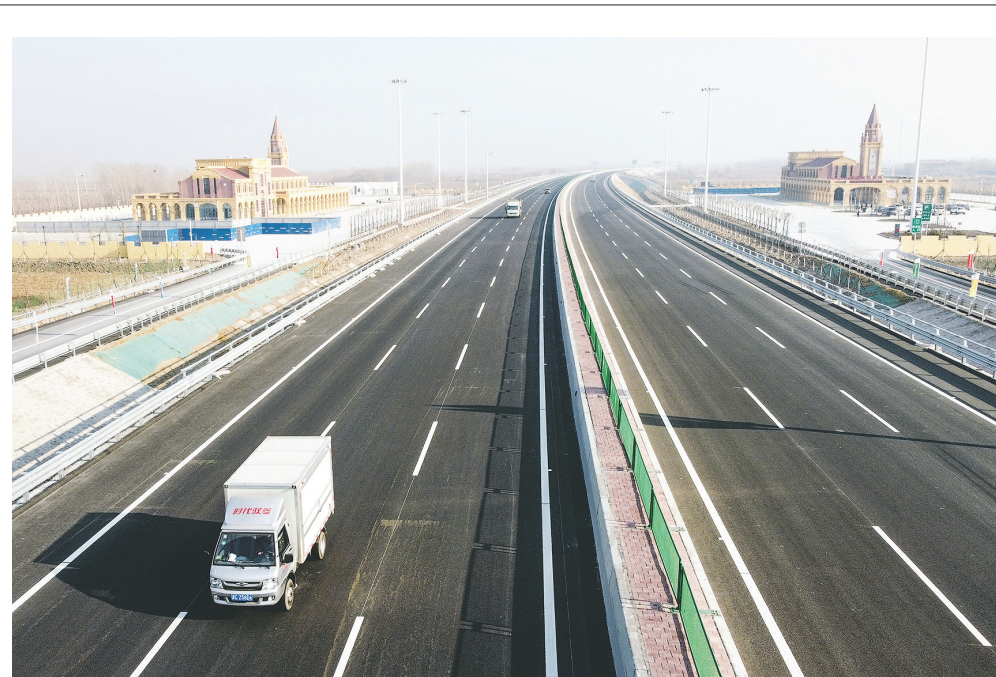
发《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典型经验对全局改革的示范、突破和带动作用。

被视为新一轮中国医改“试验田”的福建三明,于2019年12月启动疾控综合改革的新探索,设立“医防融合办公室”,推动实现专业人员、业务培训、监测报告、医防资源、考核方式、数据信息“六融合”,更好地发挥健康管护组织作用,让百姓少得病、晚得病、不得病。

三明市疾控中心主任朱道斌说,以前,医院与疾控部门之间存在业务融合不紧、沟通存在壁垒、健康管理缺失等问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考,医防协同融合的新机制体现出了明显成效和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新一轮医改中,三明甘当‘冲锋陷阵’者。向着全民健康出发,三明将把有利于人民的改革进行到底。”林兴禄说。



津石高速正式通车

12月22日,天津市至河北省石家庄市的津石高速正式通车。从天津市至石家庄市的高速通行时间缩短至3个小时。津石高速的开通运营对加快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起到重要作用。

新华社发(赵子硕 摄)

“中国汞都”如何实现绿色转型

贵州铜仁市万山区走出了一条传统农业从田到棚、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第三产业从小到大的后发赶超之路

□ 王丽 汪军

“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空旷的广场上响起歌声,四面八方的游客围拢过来。舞台上,一支全部由头发花白、身着旧式蓝色工作服队员组成的乐队,深情演唱怀旧歌曲,不禁把观众也带入“那个年代”。

湘黔交界、武陵山深处的“网红打卡地”朱砂古镇,“那个年代”文艺队演出人气很旺。这些六七十岁的队员,都是万山采矿的退休职工,他们曾因采矿辉煌而骄傲,也因采矿衰落而迷茫。如今,终于在采矿浴火重生的转型跨越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朱砂古镇所在的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鸡鸣两省,一步跨三县,被誉为“中国汞都”“朱砂王国”。20世纪50年代,万山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集采

矿、冶炼、科研于一体的汞工业基地,多年来生产的朱砂、水银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因出色完成了帮国家渡过难关和偿还苏联外债的重任,被人们称为“爱国矿”。

朱砂流丹,水银生辉,“中国汞都”万山这个“聚宝盆”曾作为工业重镇红极一时,也终因过度开采和资源枯竭,汞尽城衰。万山于2009年3月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曾任贵州汞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的李晓康,也不得不远走他乡靠打工为生。

一座留下无数辉煌与传奇的城市,将就此画上“休止符”吗?万山人在苦苦思索……

资源挖完了,但历史沧桑沉淀的文化还在。从危难境地寻找生机,当地依托良好的气候、生态和区位优势,探索发展怀旧旅游、生态农业、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开拓资源枯竭地区转型新路。

2015年7月,万山区从江西引进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投资20亿元系统开发建设朱砂古镇。2016年5月,国内第一个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山休闲怀旧小镇,开门迎接八方宾朋。

依托喀斯特地貌的独特条件,以及矿山开采留下的隧道,朱砂古镇建设坚持修旧如旧,开发了悬崖泳池、时光隧道、怀旧礼堂等诸多景点。此外,还对废弃的老矿工生活区进行改造,一条名为“那个年代”的老街将游人带入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

舞台上的周桂梅有着精致的妆容和优雅的发髻,让人难以相信她已是古稀之年。她曾是采矿幼儿园的园长,如今担任“那个年代”文艺队队长。“老矿山凤凰涅槃,赶走他乡的工人们又回来了。大家重聚一起,发挥特长和余热,这份打工的

幸福分享给自己,也分享给四面八方来的游客!”她说。

侗族老人杨前坤家住朱砂古镇附近,擅长竹编工艺品制作。旅游公司把他请到景区来,通过制作果篮、背篓等竹制品,为游客提供有乡愁味和年代感的物件。节假日游人如织,他的竹制品每天可以卖200多元。

旅游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王芳忠说,疫情过后,当地旅游业不断回暖,通过开发游玩项目,现在朱砂古镇已成为当地群众创造了约400个就业岗位。驾驶观光车,摆摊卖小吃,在博物馆当讲解员,随处活跃着“矿二代”“矿三代”的身影。

32岁的侗族解说员彭惠是名副其实的“矿三代”,她的爷爷是矿工,父亲也是矿工。高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收入不稳定,离家也很远。2018年,彭惠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朱砂古镇的解说员,如今每月工资

4000元。

她很珍惜眼前这份工作,在家门口上班,可以有更多时间培养孩子。“矿山现在不仅‘复活’了,还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红地,出去的年轻人回来了很多。”她说。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万山区通过脱贫攻坚与转型发展的结合,突破“矿竭城衰”的困境,从东部引进企业创造性发展大棚观光农业、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走出了一条传统农业从田到棚、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第三产业从小到大的后发赶超之路。

汞都转型,万山“红”遍。通过农文旅一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万山区实现了产业发展的蝶变重生。2019年,万山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7.4亿元,同比增长38.1%;观光农业产值18.5亿元,同比增长8.5%;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让信用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更大效力

“2020信用北京暨(第六届)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吴限 岁正阳报道 12月22日,“2020信用北京暨(第六届)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在京召开,本届论坛以“数字经济&服务业开放高地与信用经济新动能”为主题,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指导,中关村发展集团、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联合主办。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劲松、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副主任汪育明出席论坛并致辞。

“诚实守信已深深扎根于京华大地,已成为时代传承的城市精神。长期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信用北京’建设作为一项打基础、谋全局、管长远的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的大事来抓。”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劲松表示,当前,北京正在推进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两区”建设是中央支持北京开放发展的重大政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赋予北京的极好机遇,也为京津冀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三地深入共商京津冀协同共建大计,共同推进京津冀信用合作发展,携手打造“信用京津冀”品牌,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来推动首都实现高质量

发展,为加快“两区”建设、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汪育明表示,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中关村作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在推进区域信用协同、优化信用环境及信用便民惠企等方面,对全国有着标杆和示范作用。研究好数字经济、服务业开放与信用经济创新的关系和发展思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行稳致远,对于北京乃至全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谈及对下一步北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的期待时,汪育明提出4个要点:一要提升信用法治化水平;二要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作用,把北京的“信易贷”平台做好做优;三要加大守信激励机制建设力度;四要增强信用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据了解,“信用北京暨信用中关村高峰论坛”自2014年开始举行以来,全面展示北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关村科技金融创新与信用应用成果,为“信用北京”助力发展新思路、新方向。

此外,在论坛上,“信易贷”平台北京站正式上线启动,14家守信服务联合推进机构共同发起诚信倡议,北京信用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授牌,北京市企业创新信用领跑企业领取荣誉证书。

要闻速递

新疆库尔勒不动产登记“网上办”

本报讯 新疆库尔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创新服务理念,延伸服务触角,加快信息平台建设,不断优化不动产登记申请系统,全面推进“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实现登记申请“不跑路”、业务办理“不见面、网上办”,把服务触角延伸到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末梢。

库尔勒市是国土资源部确定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试点单位,全疆首本不动产权证从这里发出,标志着库尔勒市结束了土地、房产、林地、草原等不动产分散登记的历史,形成了权属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方便企业和群众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局长谭险峰表示,库尔勒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坚持“一站式”服务理念,以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为主题,以改进工作作风为主线,以服务对象满意为标准,创新行政审批工作机制,做深做实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规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

库尔勒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深化“放管服”改革,整合优化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不动产登记统一登记工作。在完成业务职能整合、部门人员整合和数据信息整合的基础上,再造业务流程,精准破解业务工作衔接不畅瓶颈,积极化解不动产登记“办证难”问题,推动不动产登记优化升级,将不动产登记中心努力打造成“为民登记”的坚强战斗堡垒。

(冯芸 郝加香)

“十三五”我国新增湿地面积300多万亩

本报讯 记者田新元报道 “十三五”期间,我国采取政策、法律、科学等综合措施,统筹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5年来,新增湿地面积300多万亩,湿地保护率达到50%以上。

“十三五”期间,我国持续强化湿地管理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立法工作,目前已形成《湿地保护法(草案)》,28个省份开展了省级湿地立法。2016年11月《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印发后,出台国家湿地保护管理制度14项,指导各地出台省级实施方案,

制定83项省级湿地保护管理制度。5年来,安排中央财政投入98.7亿元,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湿、湿地保护与恢复补助项目2000多个。

同时,按照湿地生态区位、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的重要性,对湿地实行分级管理,初步建立起以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为主体的全国湿地保护体系。5年来,新增国际重要湿地15处,新增国家重要湿地29处,国际重要湿地总数达64处;新增国家湿地公园201处,国家湿地公园总数达899处,湿地保护和退化湿地恢复的面积不断扩大,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有效恢复。